

# 北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何 应 忠

**内容提要** 北宋经济比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北宋经济在它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北宋经济的繁荣并非建立在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政府的严重束缚;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主要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的统治和奢侈享乐的需要。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重视,就会导出许多偏误。

北宋经济比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如果忽视了它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就必然会导出许多偏误。本文试图就北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初步的看法。

## 一、北宋经济的繁荣并非建立在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北宋的经济曾出现过繁荣的局面,但决不能把它过分夸大,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

其一,在全部手工业的生产领域中,官营手工业居于支配地位。北宋时,封建国家对手工业生产的控制,比唐代更进了一步。从组织机构看,北宋官营手工业的部门,名目繁多,组织十分严密。在中央有少府监、军器监、内侍省等机构管理;在地方有“作院”、“作坊”、“库”、“务”、“场”、“局”、“作”等名称的机构管理。从生产领域的范围看,官营手工业几乎触及手工业生产的一切领域。无论铜、铁等金属的冶铸,茶、盐、酒、矾等的采煮,军械、陶瓷等的制造,以及一般的织染工艺等,无不设官经营。从生产规模、分工看,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大、分工细。如少府监下属的文思院,“掌金、银、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器服之用”的,就有42作<sup>①</sup>;内侍省管辖的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sup>②</sup>的,也领有81作。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只不过供给皇室日常生活用品的一部分,已经有这样大的规模和细致的分工。至于其他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军器的造作、车船的制造、各种织染、盐、铁等的规模和分工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从原料来源来看,北宋官营手工业的原料来源充足,而且得到优先保证。它或来源于各州县的贡赋,如数量不足时,还可以利用“科派”、“和买”、“抽分”等方式,取得代价低廉的原料;或者于沿海口岸和边境互市点收购所需原料。从劳动力的来源看,北宋政府依靠徭役的征发,用“拘役”、“纠差”等办法,保证官营手工业得到大量的无偿劳动力;还通过“和雇”、“招

募”等方式，采用“能倍工即赏之，优给其值”<sup>③</sup>的办法，吸收高手匠人。从生产目的看，北宋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皇室集团生活和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另一部分是作为对劳动人民剥削的手段。由于北宋的官营手工业在全部手工业生产领域中居于支配的地位，占有大批的技术工匠，影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差不多满足了皇室统治集团和封建政府的需要，又缩小了民间手工业商品生产的领域和销售市场，使商品生产得不到高度的发展。

其二，皇室集团和封建政府所需的物品，除来源于官营手工业外，还来源于各州县的贡赋。各州县的贡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丝及丝、麻织品；二为工艺品；三为药材及其他土特产。贡赋的物品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也很大。如罗，每年上贡10.6480万匹；綾，每年上贡4.4906万匹；绢，每年上贡287.6105万匹；绸，每年上贡46.8744万匹；布，每年上贡55.5829万匹，由于皇室集团和封建政府可以从各州县贡赋中得到种类多、数量大的物品，这样一来，又缩小了商品生产的范围和商品销售市场，使商品生产得不到高度的发展。

其三，北宋时的城市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也大部分来自非商品生产，即自然经济基础上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这类商品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sup>④</sup>。也就是说，它们原来不是商品生产，只是这些生产物拿到市场上以后才变成商品的。由于农业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由这种情况而投到市场上的生产物，决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数量最大的是地主通过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得来，除满足自身消费外，为购买贵重的奢侈品和其他日用品而出卖的农副产品。在北宋时，地主占人口总数不到10%，却占有全国耕地的80%以上。他们通过“包租制”、“分成租制”等地租剥削方式，占有产量的一半以上<sup>⑤</sup>；有的地方，甚至乘农民遇凶荒之事，地主高利贷取两倍或三倍之息，农民全年劳动所得的农副产品，几乎全为地主高利贷掠夺<sup>⑥</sup>。所以，地主、高利贷者投入市场的农副产品的数量是很大的。至于农民，由于要向封建国家交纳赋税，也不得不拿出一些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到市场上去换取货币。如刘挚说：“农人惟有丝、绢、麦、粟之类，而助役法皆用见钱，故须随时贸易，遇于期会，价必大贱”<sup>⑦</sup>。司马光也说：“青苗、免役及赋敛多责见钱。……迫于期限，不得不半价，尽巢所收，未能充数，家之糗粮，不暇更留”<sup>⑧</sup>。小农被迫与市场联系，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要交纳封建赋役和地租。有的是为了要用自己的农副产品去换取那些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如买农具或“买葱蒜盐醯”等物<sup>⑨</sup>。总之，农副产品在一定条件下会投到市场上，成为市场上商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来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是用农民的极度饥寒换来的。农民的生活是：“戴日而作，戴星而息，……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绌褐而不完”<sup>⑩</sup>。这些现象说明，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农村自然经济。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大都来源于非商品性生产，也说明了北宋经济繁荣是很脆弱的。

总之，皇室集团和封建政府所需物品，主要来源于官营手工业和各州县的贡赋。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大都来源于非商品性生产。这些说明北宋经济的繁荣并非建立在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 二. 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政府的严重束缚

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政府的严重束缚。

其一，封建政府对一部分商品推行专卖制度。北宋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特别庞大。豢养着大批冗官、冗兵，加之对辽、夏的屈辱和议，每年要支出大量的“岁赐”、“岁币”，国家财政困难，封建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加强进行搜刮，对现实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如盐、茶、酒、矾、醋等实行国家专卖。

北宋鬻盐之法，大致分为禁榷和通商两种。所谓禁榷是不问“额盐”、“浮盐”，全部收官有，由封建政府运往行销地区出售，严禁私销私售。所谓通商，是在盐场收盐，售给商人，由商人运往指定的地区贩卖，实质上是变相的专卖，仅是让出一部分利益给贩运商人而已。北宋时，除河北、河东等路毗邻契丹，经常推行“通商”的办法外，其他各路则采用“禁榷”方式。由于官府操纵盐价，考较增亏的关系，常常使盐户濒于破产。一般群众，也因困于摊派，食用贵盐，“贫家至以盐比药”<sup>⑪</sup>。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为榷货务六……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至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sup>⑫</sup>。然后官府另标高价出售，茶利常常在十倍左右，民户若有私藏私卖，以造私盐法论罪。园户如因赔累逃亡，须邻保代为补纳，故当时四川园户有“地非生茶，实生祸也”<sup>⑬</sup>的谚语。

“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间，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如遇民间有婚丧大事，官吏便乘机计算民户大小“违法抑配，大收价钱”<sup>⑭</sup>。有些地方还专造酒曲，售给酒户。而且在官卖制度下，又有包销式的“买扑”法，或投标式的“投状”法，从事竞卖，以致“累界有增无减”<sup>⑮</sup>，每界超出旧额至三倍以上。

矾，是染业、浸铜和制革所需之物品，多产于河东汾、晋、慈、湿等州。一般也是官府就现场收购，严禁户私卖。当时官定的收购价格是白矾一驮（140斤），给钱六十文，而出售每驮却是十二贯五百文至二十三贯不等。

“元祐臣僚请罢榷醋，户部无禁文。后翟思请以诸郡醋坊日息用余，悉归常平”<sup>⑯</sup>。可见醋也是专卖。

太宗至道时，政府专卖的总收入，一年已达1123.3万余贯，成为北宋政府财政中重要的收入。可见，封建政府对人民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以垄断的形式提高物价，对人民进行搜刮。这样一来，既加重了人民负担，又缩小了民间工商业经营的范围和市场，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二，封建政府限制民间手工业内容。政府常以法令改变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内容，甚至禁用某些产品。如仁宗明道年间，曾下令“减两蜀岁输绵绮、绫罗、透背、花纱三分之二，改织细绢以助军”。“景祐初，遂诏罢输绵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绢，目掖廷以及闾巷皆禁

用”<sup>①⑦</sup>。各地类似此情况的，当不在少数。政府以法令强制改变手工业生产内容和禁止使用某些产品，必然打击民间手工业者，使民间手工业生产范围日益狭窄，销售市场日益缩小，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三，北宋封建政府还不断凭借专制权力对工商业者实行掠夺式的征调，强迫为官府服役，并受到漫无限制的掠夺。《愧郾录》载：“今世郡县官府，营缮创缔，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计在市之朴斫规矩者，虽店楔之役无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间有幸而脱，则其侪相与讼挽之不置，盖不出不止也，谓之纠差”<sup>①⑧</sup>。《东京梦华录》也载：“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担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应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头帽披肩；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等色目”<sup>①⑨</sup>。编行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于官府的差遣，又起着同行互相纠察的作用。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京师供百事有行，虽外与诸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需索，无虑十倍以上”<sup>②⑩</sup>。这种掠夺式的征发，大大影响手工业者的生产和扰乱了市场。所以有些行业的工商业者，便用交“免行钱”的办法，来稳定生产，维持市场秩序。如肉行的“行人徐中正等状：屠户中下户二十六户，每年共出免行钱六百贯文赴官，更不供逐外肉”<sup>②⑪</sup>。很显然肉行的“免行钱”是衙门低价买肉或无偿要肉造成的。到王安石变法时，这种任意苛派的征役办法，被收定为正式的征税项目，名曰“免行钱”。史载：“在京诸色行户，总六千四百有奇，免输官中祇应，一年共出缗钱四万三千三百有奇”<sup>②⑫</sup>。可以想见当时汴京城内工商业者被勒索苛派之繁重。封建政府不仅在官营手工业中奴役了大批工匠，而且用权力把手工业者编制起来，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后备军。对城市商人也同样编制起来进行掠夺。这种编制，实际上是套在工商业者头上的枷锁，行分得越细，枷锁越紧。封建统治者可以随时搅乱工商业者的生活，束缚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四，繁重的商税。北宋时，商税由专门设置的“商税务”负责征收。商税务遍于全国各地，除个别州县外，一般都设有这种机构。各州县设“务”的数量多少不等，每个县大都有一个以上的务，如太宗时所设商税务多达1835个。神宗时增加到2100多个。对于一些不便设商税务的小市、镇，封建政府还采用“买扑”的办法，由商人或地主包揽。所收税款称为“坊场钱”。如神宗元丰六年所收坊场钱即达“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谷帛九十七万六千石匹有奇”<sup>②⑬</sup>。从商税务的分布状况和坊场钱的征收办法，可以看出北宋时商税的征课组织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严密的商税网。当时的商税，政府虽然规定只交纳“过税”和“住税”，即“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sup>②⑭</sup>。但征收货物的种类都非常繁杂，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鼈、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农器、鹅、鸭、紫草、竹木、纸扇、芒、水果、梳等细碎之物都有税，行旅河渡也有税。故商税的年征收总额，仁宗时已高达1975贯，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封建政府对工商业者的残酷剥削，严重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五，封建政府垄断边境榷场贸易和海外贸易。北宋时，对北面和西北面的辽、西夏的贸易，所设置榷场的州军，都有固定的场址，不得随意改动。由政府派官吏和军健管理，维持治安。榷场贸易有政府规定的章程条例，所谓“官私交易，悉从旧规”<sup>②5</sup>，不得违犯。榷场的货物来源，也由京师的榷货务供给，至于茶、布等需要量很大的商品，虽也允许商人从产地贩运到“边郡入中”<sup>②6</sup>，但控制是很严格的。榷场交易的货物也有限制。如宋向辽输出的有茶、香药、犀象、苏木、缯帛、漆器等品。从辽进口的有银钱、羊马等；宋向夏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物。从夏进口的有羊、马、牛、驼、玉、蜜腊、毛褐、羚羊角、硝砂、紫胡、红花、翎毛等物。可以看出，从榷场地点的选定，经营管理、贸易方式、货物来源及交易货物的内容，都完全由封建政府所垄断和控制。

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四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作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鍍铁、鼈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与民’。”可见海外贸易也是由封建政府垄断和控制。

总之，北宋封建政府利用专卖制搜刮人民，用法令限制手工业生产产品的内容。加上对工商业者进行掠夺式的劳役征调，征收繁重的商税，以及对榷场和海外贸易的垄断和控制，都缩小了工商业者经营的范围和市场，严重地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 三、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的统治和奢侈享乐的需要

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前代，作为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更是空前繁荣。但是，它的发展，繁荣主要是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的统治和奢侈享乐的需要。

其一，北宋的城市是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但也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村的基地。城市中设置着封建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法庭、监狱，驻扎着大批军队和扈从人员。各个城市都被地主、贵族和皇室严密地控制着。这种情况，我们从那时城市的建筑规划、布局及其不同的规模，都可以清楚看出。如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汴京，整个城市就以皇宫和官府为中心，分别围着三重城墙。内部是“皇城”，其次是“内城”（或称旧城），外部叫做“外城”（或称新城）。州县所在地的城，则大都分两重，内面的叫做“子城”，外面的叫做“罗城”。皇宫和州县衙门都占据了城市中心最好的位置。这样的城市结构和布局，正反映出它服务于封建统治的需要，是封建统治的中心。由于城市是封建统治的中心，所以政治地位越是重要的城市，城市建筑的规模越大。地主、官僚和贵族也就聚集越多，消费量就越大，商业也就越繁荣，商税征收额也就更加庞大。《文献通考》所载的商税额，就足以说明这点。一般地说，总是县的治所高于市镇，路的首府高于县的治所。

另外，从当时城市发展的一般情况看，不少是由于位居水陆冲要，便利货物的运输集散，逐渐形成居民集中的市镇；随着商业的繁荣，市镇规模的不断扩大，最后就转化成封建的统

治中心。如另壁镇的官僚欲改镇为县治，就是为了加强控制和剥削。这个例子也说明，市镇居民中最有势力的并不是工商业者，而是地主官僚分子。总之，北宋时期的城市，总是大大小小的政治中心，编入州县系统中，而且工商业者在城市中总是处于附属的地位。

其二，城市中工商业活动及贸易情况，也说明了它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封建统治阶级。如汴京城内的宫城南边从宣德门向东直到新漕门一带的商业区，主要是经营奢侈品店铺和供地主、官僚和贵族寻欢作乐的场所。宣德门前大街往东是有名的潘楼街。街南有鹰商的旅馆及珍珠、绸缎、香药等商铺。街北高耸着的是叫潘楼的大酒楼，其下每天从黎明就开市，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等物品。东面的北边，接着赵十万宅、郑皇后宅等大宅第。南边有叫中山正店的酒楼。再走近旧曹门，有山子茶坊、李生莱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等夹道并列。出了旧曹门，除中央大街外，有南北斜街，即所谓狭斜巷。由大街往东，就是牛街，有下马刘家药铺、看牛酒店及妓馆连轩相望<sup>②7</sup>。又“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直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sup>②8</sup>。其他街巷的情况，据《东京梦华录》所载，也是大同小异。可见街巷中的商业贸易，主要是供封建统治阶级吃喝玩乐的东西。

其三，再从城市的市集贸易情况看，如汴京城内部的相国寺，地处汴河北岸，交通便利，规模宏阔，游人众多，是十分繁华的市集。《燕翼贻谋录》载：“东京相国寺乃寺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会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sup>②9</sup>。其贸易具体情况是，“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幙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帟、洗漱、鞍、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密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幙头帽子、特髻冠子、缘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笈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sup>③0</sup>。可以看出，相国寺的集市贸易，主要是珍禽奇兽，家传秘制的工艺美术品，或诸寺师姑的手工精制品。大多数是供地主、官僚和贵族享用的东西，少数是城市居民的消费品。这反映出城市的市集贸易也是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的。

其四，商业贸易中，交易额最大、利润最厚的商品是奢侈品。从商品贩运方面的情况看，商人能够获得厚利并进行巨额贸易的商品，不外是各地少数珍奇手工业产品。至于日常所需的手工业品，不但利润不厚，同时也不能引起巨额贸易。所谓“小商，近贩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亦无足信；惟富商贩锦，自蜀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sup>③1</sup>。城市内部的贸易、交易额最大的也是奢侈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载：“……潘楼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米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卷一三《铺席》条载：“自融合坊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而且奢侈品的利润也是最厚的，从

广州运到京师,可以获得两倍的利润。可见,贩卖一般商品的小商经济地位是很微弱的。而富商巨贾则争趋于珍奇货物的运销,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这反映出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是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

其五,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也较发达。北宋统治者设立广州等市舶司和其他管领海商的机关来管领海商。当时,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国,都有商业贸易往来。北宋输出的是金、银、缙钱、铅、锡、杂色帛、瓷器等;海外输入的则是“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鍍铁、鼈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橈、苏木等物”<sup>②</sup>。从进口的货物可以看出,东南海上贸易,主要是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奢侈享乐的需要。

总之,作为北宋商品经济活动中心的城市其建筑的规划、布局、规模,都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中心的需要;城市内部以及城市集市的商业活动及贸易情况,也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吃喝玩乐服务,故交易额最大的、利润最厚的商品是奢侈品;东南海上的对外贸易,也是服从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需要。所以,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服务于地主、官僚和贵族的统治和奢侈享乐的需要。

(历史系何应忠教授因病于1990年10月19日去世。现发表他这篇遗作,以表纪念)

#### 注:

- ①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
-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
- ③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〇《宣仁后山陵采石记》。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6页。
- ⑤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原弊》。
- ⑥ 方回:《古今续考》。
- ⑦ 刘摯:《忠肃集》卷三《论助役十害疏》。
- ⑧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七《乞罢免役状》。
- ⑨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五《论免役钱札子》。
- ⑩ 脱脱:《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 ⑪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
- ⑫⑬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茶。
- ⑭⑮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 ⑯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
- ⑰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布帛。
- ⑱ 岳珂:《愧郈录》卷一三《京师木工条》。
- ⑲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
- ⑳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
- ㉑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
- ㉒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
- ㉓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征榷考》。
- ㉔②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 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二。
- ㉖ 《宋史》卷二七七《索湘传》。
- ㉗ 《东京梦华录》卷二《东楼角街巷》、《潘楼街巷》。
- ㉘ 《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
- ㉙ 王得臣:《尘史》卷下亦有类似记载。
- ㉚ 《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
- ㉛ 周去非:《岭外代答》。

(责任编辑 宾长初)